

导 论

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的蓬勃发展，缔造了辉煌的经济、文化业绩，成为前近代的一抹亮色。至今仍留下深深的印迹。南浔镇、周庄镇、同里镇、乌镇、西塘镇、朱家角镇、甬直镇、七宝镇等，作为历史文化遗产，备受世人瞩目。人们在对它们流连忘返、赞颂备至的同时，很自然要对它们的历史踪迹，对它们曾经的辉煌以及它们所走过的兴衰之路有所了解。人们对它们的认识，当然不会仅仅满足于走马观花、浮光掠影，不会仅仅满足于小桥流水人家这种浅表层次。人们对它们的依恋和珍惜，充满了怀旧感。这种怀旧感，并非颓废的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对历史的尊重，是对已经消逝，离我们远去的文明的一种追忆，是对过去曾经有过，而今仍萦绕于心的辉煌业绩的怀念。这或许就是关于江南市镇的研究，历经几十年而不衰的原因吧！历史并非现实，但是，历史与现实的联系毕竟难以割断，对于现实中早已消逝的辉煌，人们是备加珍惜的。

怀着这种心情，笔者撰写了这本书。书名之所以定为“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是想把笔者对江南市镇的感受，传达给读者诸君：现在看来古色古香、恬淡宁静的江南市镇，曾经一度引领时代潮流，带动了社会的变革。现今旅游者们所看到的江南市镇硕果仅存者，只是它们留下来的一个空壳，甚至是经过人为加工的空壳。殊不知，它们过去是充满经济活力的工商业中心，吸引着大江南北的富商大贾，包括徽州商人、山西商人、陕西商人、闽粤商人，的丝绸、棉布等本

地名牌产品的集散地 是拥有几百家店铺、牙行、作坊、茶楼、酒肆 居民数千户乃至上万户 热闹非凡的“地方小都市”(海外学者语)。本书目的在于,把这个空壳曾经拥有的内容,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真实地复原在读者诸君面前;即不是将怀旧仅停留在空壳的层面上,而是再现它过去辉煌的真实动态的各个方面。

江南地区经过长期的开发,到明代进入经济高度成长时期,最先显示出传统社会正在发生的变革,社会转型初露端倪。农家经营的商品化程度日益提高,以农民家庭手工业为基础的乡村工业化(即学者们所说的早期工业化),在丝织业、棉织业领域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工艺精湛的生丝、丝绸、棉布不仅畅销于全国各地,而且远销海外各国,海外的白银货币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从这个意义上讲,江南市镇已经领先一步进入了“外向型”经济的新阶段。这样说,并非夸张,而是历史的本身。这恐怕是现今崇尚“外向型”经济的人们难以想象的。然而,它却是不争的事实。

一、全球化贸易与江南市镇

15世纪末 16世纪初 是世界历史上的“地理大发现”时代 或者说“大航海时代”。葡萄牙人绕过非洲好望角 进入印度洋 占据印度西海岸贸易重镇果阿(Goa),以及东西洋交通咽喉马六甲(Malacca) 来到中国东南沿海。西班牙人发现美洲“新大陆” 后来绕过美洲南端进入太平洋,到达菲律宾群岛以及中国沿海。这两个国家的商人都把与中国贸易当作首要任务,或者说作为牟取巨额利润的重要渠道。这样就使中国进入了全球贸易的网络之中。

葡萄牙人为了把中国商品运往各国,以澳门为中心,构建了几条国际贸易航线:澳门—暹罗(泰国)—马六甲(马来西亚)—果阿

(印度)—里斯本(葡萄牙)航线,澳门—长崎(日本)航线,澳门—马尼拉(菲律宾)—阿卡普尔科(墨西哥)航线。在这些航线上航行的大帆船,把中国的生丝、丝绸、棉布、瓷器等商品,运往各国。葡萄牙人以澳门为中心来安排远东贸易,每年五月至六月,他们乘坐大帆船,顺着夏季的西南季风从果阿起航,装载着胡椒、苏木、象牙、檀香等印度货物,以及原产于美洲,经里斯本转运来的白银货币,抵达澳门。在其后的一年中,把货物与白银换成中国的生丝、丝绸、黄金、铅、水银、糖、麝香、茯苓、棉纱、棉布等商品,在第二年初夏,乘着季风继续东航,进入日本长崎,把生丝、丝绸、棉布等中国商品,以高昂的价格迅速脱手,然后装上日本白银以及少量其他货物,乘着同年秋天的季风返回澳门。他们再在澳门用日本白银大批购买中国的生丝、丝绸、瓷器、黄金等物,到第三年秋天,才乘着季风返回果阿。由澳门运往果阿,再由果阿运往里斯本的中国商品,数量最大的是生丝。1580—1590年从澳门运往果阿的生丝有3000担,价值白银240000两,利润达白银360000两;1636年从澳门运往果阿的中国生丝有6000担,价值白银480000两,利润达白银720000两。由于中国对印度等地的香料之类商品需求量不大,葡萄牙商人必须用大量白银来购买中国商品。这些白银是墨西哥、秘鲁出产的,由葡萄牙、西班牙商人运往欧洲大陆的塞维利亚、里斯本,再运往果阿。以至于当时马德里商人说,葡萄牙人从里斯本运往果阿的白银几乎全部经由澳门进入了中国。

据日本学者的研究,当时日本对中国生丝的需求量是很大的(用来制作绢制品)。当时大内氏城下町山口的机织业名闻遐迩,最大的机织业中心莫过于京都的西阵;但生丝产量严重不足,17世纪日本的生丝总需求量为三四十万斤,几乎完全仰赖葡萄牙商

① C. R. Boxer, *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m; 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 1555—1640*, Lisbon, 1963, pp. 181—182. 全汉昇《略论新航路发现后的海上丝绸之路》载《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2期,1986年。万明《早期中葡关系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52页。

人从中国运来^①。据统计,1600年前后葡萄牙商人从澳门运往长崎的中国商品,首屈一指的就是生丝(500~600担)丝线(100~500担)、绸缎(1700~2000担),它们的利润率分别是75%~87%、164%~186%、111%~127%;其次便是棉纱(200~300担)、棉布(3000匹),利润率分别是128%~157%、177%~186%^②。

西班牙商人的“马尼拉大帆船”(Manila galleon)则把福建月港运来的中国商品运往美洲墨西哥、秘鲁、巴拿马、智利。马尼拉大帆船抵达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后,就在当地举办盛大的集市,中国价廉物美的生丝、丝绸深受欢迎,十分畅销。其影响之大,据说使得当地的丝织业就此趋于衰落。1600年,西班牙殖民当局对当地的养蚕户加以限制,断绝了本地蚕丝的供应,由源源不断输入的中国蚕丝为墨西哥的工厂提供原料。

据严中平的研究,西班牙占领菲律宾以后,从中国运去的棉布很快就成为当地土著居民的生活必需品。1591年西班牙的菲律宾总督发现,当地土著居民因为服用中国衣料,不再种棉织布,所以下令禁止土著居民服用中国衣料(丝绸、棉布)。1592年这个总督报告西班牙国王说,中国商人收购菲律宾棉花,转眼就从中国运来棉布。棉布已成为中国在菲律宾销路最大的商品。同样,至迟在1680年代,中国丝绸就已威胁到西班牙产品在美洲的销路。17世纪初,墨西哥人穿丝绸多于穿棉布。到了1637年,情况愈发严重,墨西哥的丝织业都以中国丝为原料,墨西哥本土蚕丝基本上被消灭了。邻近墨西哥的秘鲁也是中国丝绸的巨大市场,中国丝绸在秘鲁的价格只

① 大隅晶子《十六、十七世纪的中日葡贸易》,载《东京国立博物馆纪要》第23期(1998年)。

② C. R. Boxer 前揭书,第179~181页。黄启臣、邓开颂《明清时期澳门对外贸易的兴衰》载《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3期。

③ 艾·巴·托马斯《拉丁美洲史》(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3年,第131~132页、191~199页、222页。

有西班牙制品价格的三分之一。中国丝绸不仅泛滥于美洲市场，夺取了西班牙丝绸在美洲的销路，甚至绕过大半个地球，远销西班牙本土，在那里直接破坏西班牙的丝绸生产。

无论是澳门—果阿—里斯本航线、澳门—长崎航线，还是月港—马尼拉—阿卡普尔科航线，中国出口的商品都是以生丝、丝绸、棉布为主，而进口的只有少量的香料之类，葡萄牙、西班牙始终处于贸易逆差之中，中国则始终处于贸易顺差之中。贸易的不平衡，导致对方不得不支付巨额的白银货币。因此，这种贸易被外国学者称为“丝—银对流”或“丝—银贸易”。这种状态持续了两个半世纪，美洲的白银与日本的白银大量流入中国，成为当时全球化贸易中一道独特的风景。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把西方国家这种结构性贸易逆差称为“商业上的‘纳贡’”，他在《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一书中写道：

在1800年以前，欧洲肯定不是世界经济的中心。无论从经济分量看还是从生产、技术和生产力看，或者从人均消费看，或者从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机制的发展看，欧洲在结构上和功能上都谈不上称霸。16世纪的葡萄牙、17世纪的尼德兰或18世纪的英国在世界经济中根本没有霸权可言……在所有这些方面，亚洲的经济比欧洲“发达”得多，而且中国的明—清帝国、印度的莫卧尔帝国，甚至波斯的萨菲帝国和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所具有的政治分量乃至军事分量，比欧洲任何部分和欧洲整体都要大得多；

（1500—1800年）整个世界经济秩序当时名副其实地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外国人，包括欧洲人，为了与中国人做生意，不得不向中国人支付白银，这也确实表现为商业上的“纳贡”；

“中国贸易”造成的经济和金融后果是，中国凭借着在丝绸、瓷器等方面无与伦比的制造业和出口，与任何国家进行贸易都

是顺差。因此，正如印度总是短缺白银，中国则是最重要的白银净进口国，用进口美洲白银来满足它的通货需求。美洲白银或者通过欧洲、西亚、印度、东南亚输入中国，或者用从阿卡普尔科出发的马尼拉大帆船直接运往中国。

这是多么振聋发聩的论断！对此学者们或许见仁见智，有不同意见，但他所揭示的历史事实——西方国家在与中国的贸易中始终处于结构性逆差之中，却是无可置疑的。

关于这点，中国学者早已有所关注。梁方仲的论文《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指出：“欧人东航以后，银钱及银货大量地由欧洲人自南北美洲运至南洋，又运来中国……由万历元年至崇祯十七年（1573—1644年）的七十二年间，合计各国输入中国的银元，由于贸易的关系的，至少远超过一万万元以上。”^②而对此研究得最为精深的当推全汉昇。他在1969年发表于香港《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2卷第1期的论文《明清间美洲白银的输入中国》系统的分析了这个问题，所提供的资料与结论，至今无人能够超越。他写道：

自1565年起至1815年止，共达两个半世纪之久，西班牙政府每年派遣一艘至四艘（通常以两艘为多）载重由三百吨至一千吨（有时重至二千吨）不等的大帆船（gallon）横渡太平洋，来往于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Acapulco）与菲律宾马尼拉（Manila）之间；

在16、17、18世纪间，每年由大帆船自美洲运往菲律宾的银子，有时多达四百万西元，有时只有一百万西元，但以二三百万西元的时候为居多……到了1765年2月10日马尼拉最高法院

① 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译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27页、166～167页、169页。

② 梁方仲《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载《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6卷第2期（1939年）。

检察长向西班牙国王上奏说：“自从菲律宾群岛被征服（1565年）以来，运到这里的银子已经超过二万万西元。”其后，依照德科民（De Comyn）的计算，在由1571年至1821年的二百五十年中，自西属美洲运抵马尼拉的银子，共为四万万西元。

全汉昇认为，这四万万西元（即比索）当中，至少有一半甚至更多一些流入了中国^②。

全汉昇的这一研究成果，受到西方学者的广泛关注，法国年鉴派学者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中说：“一位中国历史学家最近认为，美洲1571年至1821年间生产的白银至少有半数被运到中国，一去而不复返。”就是征引全汉昇的结论。

布罗代尔认为，16世纪“各种协力促成的运动”是从西班牙前往美洲。从贸易角度看，马尼拉大帆船代表着一条特殊的流通路线。美洲白银1572年开始一次新的分流，马尼拉大帆船横跨太平洋，把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同菲律宾的马尼拉连接起来，运来的白银用于收集中国的丝绸和瓷器，印度的高级棉布，以及宝石、珍珠等物。他认为，这种远程贸易对中国东南沿海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影响。从事对外贸易的中国商人在1638年日本实行闭关锁国后，同荷兰商人一样，甚至比后者更加有效地参加与日本列岛的丝绸和白银的贸易；他们在马尼拉接收大帆船从阿卡普尔科运来的白银；中国始终派人出外经商，中国的工匠、商人和货物深入南洋群岛每个角落。

这种盛况与江南市镇有着密切的联系，出口的生丝、丝绸主要来源于太湖流域的丝绸业市镇。正如全汉昇所说：“在近代西方工业化成功以前，中国工业的发展，就其使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

^② 全汉昇《中国经济史论丛》第一册 香港新亚研究所，1972年 第435～450页。

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二卷（中译本）三联书店，1993年 第167～197页、432～435页、647页。

有强大竞争力来说，显然曾经有过一页光荣的历史。中国蚕丝生产普遍于各地，而以江苏和浙江之间的太湖流域最重要……海外市场对中国丝与丝绸需求非常大，因而刺激这个地区蚕丝生产事业的发展，使人民就业机会和货币所得大量增加，当然是一个重要因素。’^①全汉昇所说生丝与丝绸的出口，“以江苏和浙江之间的太湖流域最重要”，指的就是江南丝绸业市镇集中的地区。这些市镇及其四乡以出产优质生丝与丝绸而闻名于世，被称为“湖丝”——湖州及太湖周边出产的生丝的通称，它的著名品牌“辑里丝”就是南浔镇的辑里村为中心的地区出产的湖丝品牌，在国际市场上享有极高的声誉。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两广总督李侍尧在一份奏折中说：“外洋各国夷船到粤，贩运出口货物，均以丝货为重。每年贩运湖丝并绸缎等货，自二十余万斤至三十二三万斤不等。统计所买丝货，一岁之中，价值七八十万两，或百余万两。至少之年，亦买价至三十余万两之多。其货物均系江浙等省商民贩运来粤，转售外夷，载运回国。”^②这条史料揭示了当时外贸的实况：外国商船到清朝官方指定的贸易口岸广州，所买货物都以丝货为主，而这些丝货又以太湖流域的“湖丝”以及绸缎为主。这些由江苏、浙江等商民贩运到广州的出口“湖丝”及绸缎，每年的交易额在数十万两至百余万两白银上下，并不是一个小数字。

这样的外贸形势，刺激了江南市镇的蚕桑丝织业的蓬勃发展，进入了“外向型”经济的轨道。这种情况早在明代后期就已初露端倪，随着马尼拉大帆船把从福建运来的湖丝及丝织品运往美洲。在马尼拉港，“当日在中国每担值银一百两的湖丝，运到那里出售，起码得价二倍。除西班牙人外，有时日本人也在哪里收购湖丝。

全汉昇《略论新航路发现后的海上丝绸之路》，载《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2期（1986年）。

《史料旬刊》第十五期，李侍尧《奏请将本年洋商已买丝货准其出口折》。

当大家在市场上争着购买的时候，湖丝价格更急剧上涨，每斤售银五两，即每担售银五百两^①。处于对外贸易前沿的福建、广东，鉴于太湖流域的湖丝及丝绸外销势头的旺盛，也纷纷从事以湖丝为原料的丝织业。全汉昇写道：“当太湖沿岸居民大规模种桑养蚕的时候，因原料供应充裕而产量增加的丝织工业，并不以江、浙各地为限，就是距离较远的福建、广东，也因能够利用品质优良的湖丝或吴丝而织造出更多更好的绸、绢、纱、缎等物……此外，福建以南的广东也出产蚕丝，但丝质不佳，故那里丝织工业也以吴丝来织造甲于天下的纱、缎。”^②

太湖流域的湖丝及丝绸的出口，进入清代以后更趋兴旺。从1670年代末期起，一直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生丝的出口欧洲，逐渐有了历年可以比较的统计数字。1679—1833年的155年中，每年的出口量从8担上升到9920担。从1840年代中期起，每年的出口量经常在5万担以上；1890年代初，中国生丝的出口量第一次突破10万担大关。到1920年代末，中国生丝出口曾经达到19万担的高峰。1845—1929年的85年中，仍保持年增长率3.5%的上升趋势。

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五口通商以后，湖丝不再辗转至广州出口，而是就近在上海出口，刺激了出口数量的猛增。湖丝集散地南浔镇的丝商到上海经营湖丝出口贸易者日渐增多，成为近代上海丝业巨头。例如陈煦元，“侨沪数十年，为丝业领袖，能通译西语，而出以笃诚，中西丝商倚为长城。”^④

资料表明，进入1870年代，出现了湖丝的全盛时期；1890年以

① 全汉昇《自明季至清中叶西属美洲的中国丝货贸易》，载全氏《中国经济史论丛》第一册，第459页。

同上书，第454页。

③ 汪敬虞《中国近代生丝的对外贸易和缫丝业中资本主义企业的产生》，见《汪敬虞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341～342页。

④ 民国《南浔志》卷二十一 人物。

后的几年中，年输出量达 10 万担上下^①。刘大钧在谈到辑里丝深受西人欢迎、外销日趋增加的走势时说：“大约自 1870 年左右而后，至 1920 年后止，为时计五十年，丝业贸易兴畅，蚕桑区农民繁荣，乃造成湖州蚕桑事业之全盛时期。”^②

《吴江丝绸志》也说，上海开埠后，上海成为主要的辑里丝出口市场，而辑里丝主要来自湖州的南浔镇与吴江的震泽镇。光绪六年（1880 年）仅震泽镇一地出口的辑里丝就达 5400 余担，占了全国生丝出口总量的十五分之一。

从上面的简要分析中，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到，江南丝绸业市镇在全球化贸易中所具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

棉布业市镇在棉布出口中的地位也是如此。早在晚明时期，中国棉布已经畅销海外，由于价廉物美而在世界市场上所向披靡。中国棉布远销南洋群岛，在 16 世纪后期有了历史文献的记载。17 世纪初，被称为 Cangas 的中国棉布，由澳门向南洋的望加锡和交趾支那出口。与此同时，中国棉布由澳门开往长崎的商船运往日本。18 世纪初，中国棉布销往俄国，称为 Kitaika 的中国棉布在对俄出口商品中占据首位。1730 年代，中国棉布首次由英国东印度公司运销英国，以后几乎遍及欧洲国家以及北美大陆。

而这种畅销海外的中国棉布，主要来自江南市镇。严中平指出，大量江南棉布进入海外远程贸易，甚至在 18—19 世纪间远销英国等海外市场^③。全汉昇说得更加明确：“早在十八世纪的三十年代，英国东印度公司已经开始购运‘南京棉布’（Nankeen）。南京为清代江苏省治，两江总督驻在那里，可以说是江苏的代表，故外人称江苏出

秦惟人《清末湖州的蚕丝业和生丝的输出》，见《中岛敏先生古稀纪念论集》下卷，日本东京汲古书院，1981 年。

刘大钧《吴兴农村经济》，上海文瑞书店，1939 年，第 121 页。

周德华《吴江丝绸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37—38 页。

汪敬虞《从棉纺织品的贸易看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见《汪敬虞集》第 367—368 页。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55 年，第 32—33 页。

产的棉布为南京棉布。在鸦片战争后不久，一个在上海附近考察的英国植物学者也说：‘在上海附近种植的棉花，名曰南京棉花，用它纺织成的棉布，叫做南京棉布。’^①全氏征引 H. B. Morse 和 R. Fortune 的论著，揭示了西方人心目中十分流行的概念——“南京棉布”(Nankeen)，实际上就是南京这个地名的英译。它充分表明，远销海外的中国棉布主要是江苏生产的。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既然“南京棉布”的定义是“上海附近种植的棉花”纺织成的棉布，那么，与其叫做南京棉布，不如叫做上海棉布或松江棉布，更为确切。事实上，明清两代松江棉布以其质地精良而畅销于海内外，被称为“衣被天下”是名副其实的。

1786—1833 年的 48 年中，英国、法国、荷兰、瑞典、丹麦、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商船从广州购买的“南京棉布”共计 4400 余万匹。各国商船从广州购买“南京棉布”最多的一年是 1819 年，共达 330 余万匹，价值 170 余万银元。1817—1833 年的 17 年中，各国商船从广州购买的“南京棉布”共计 1900 余万匹，平均每年输出 110 余万匹，价值达 78 万银元左右^②。1804—1829 年的 26 年中，美国商船从广州购买“南京棉布”3300 余万匹，平均每年购买 120 余万匹。美国商船从广州输出的“南京棉布”大部分运回本国，小部分运往欧洲、西印度群岛、南美洲、马尼拉及夏威夷等地^③。在本书第四章“棉纺织业与棉布业市镇”中，我们还将讨论这一情况。

明清两代江南市镇及其四乡生产的生丝、丝绸、棉纱、棉布，不仅行销全国，而且行銷海外，在全球化贸易中，遍及亚洲、欧洲、美洲。这种盛况，是汉唐盛世的“丝绸之路”所望尘莫及的。连续几个世纪，数量巨大的货源，从江南市镇流向海外，刺激了江南市镇的繁荣昌盛。把这种江南市镇经济称为外向型经济，是毫不为过的。

① 全汉昇《鸦片战争前江苏的棉纺织业》见全氏《中国经济史论丛》第二册 香港新亚研究所，1972 年 第 638~639 页。

同上书 第 639 页、640~641 页。

③ 同上书 第 639 页、642 页。

二、江南市镇的乡村工业化——“早期工业化”

2000年李伯重推出新作——《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在学术界引起强烈的反响。题目看似标新立异，其实极富创新精神。他把西方学者关于欧洲早期工业化的理论与方法，运用到对于中国江南经济的研究中，认为明清时代在1550—1850年的三个世纪中，江南出现了早期工业化。这种对历史的重新解读，令人耳目一新。

一提起中国的早期工业化，人们很自然的联想，就是近代洋务运动中的早期工业化。很少有人会想到，1850年以前的三个世纪中，江南已经出现了早期工业化。李伯重从纺织业、食品业、服装制作业、日用百货业、菸草加工业、造纸业、印刷业、工具制造业、建材业、造船业等方面，展开论证。他所得出的结论是，1850年以前的三个世纪中，江南工业的发展，使得工业在江南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日益提高。到了19世纪初，在江南大部分地区，工业的地位已与农业不相上下，在经济最发达的江南东部，甚至可能已经超过农业。用西欧的标准来衡量，此时江南农村可能已经“过度工业化”了。此语出于美国学者伊懋可（Mark Elvin）。伊懋可鉴于明清时期的中国农村工业的发展引人注目，认为当时的中国农村可能已经“过度工业化”和“过度商业化”了。伊懋可此语并不专指江南，但是由于江南农村工业最为发达，因此江南应是最“过度工业化”的地区。

为了避免误解，李伯重在该书的第一章“导论——本书题解”中，对“早期工业化”作了解释：“所谓早期工业化指的是近代工业化之

前的工业发展，使得工业在经济中所占地位日益重要，甚至超过农业所占的地位。由于这种工业发展发生在一般所说的工业化（即以工业革命为开端的近代工业化）之前，因此又被称为‘工业化前的工业化’。^①一些西方学者把近代早期欧洲农村工业的重大发展，称为“原始工业化”，指的是欧洲许多地区农村家庭手工业生产的重大发展。

确实，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与欧洲是可以找到共同点的，或者说是可以比较研究的。王晋新《深刻而全面的经济变革——论 16—18 世纪中叶英国社会经济》对此有所分析，其中有两点就颇值得注意，而且与中国江南颇有相似之处。

其一，农业经济的商业化。英国著名的伊丽莎白时代史专家罗斯在《伊丽莎白时代英国的社会结构》中指出：16 世纪下半叶英国出现了一个从中世纪那种相对静止的状态向以货币、市场及商业交换为基础的更自由、更具流动性状态迅速而集中的转变。这种转变在此后便延续不断且愈演愈烈，这在当时英国农业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都有反映和表现。其结果是在农场经营中采用了商业的方式，人们不断调整生产以适应市场条件，商业化已成为英国农业的主导性趋势。

其二，工业的乡村化和乡村的工业化。杜普莱西斯在《早期欧洲现代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中，对中世纪西欧工业地理的变迁轨迹进行考察时说：中世纪欧洲工业地理是流动性的。在中世纪早期，大部分工业品生产在农村，在中世纪接近尾声时，农村的工业生产再次兴旺起来。15 世纪前后，西欧诸国工业地理布局都出现或大或小的向农村转移的现象，形成一种工业乡村化趋势。西方学术界在这一领域代表性研究成果有：门德尔斯提出的“原工业化”理论，而后德国学者的《工业化之前的工业化》以及布罗代尔的《论文明与资本主

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 1550—1850 年》第 2 页。

② 同上书 第 6~7 页

义》、《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在工业向乡村转移或乡村工业发展上，英国是西欧诸国中发展最快的国度。乡村工业的勃兴是16—18世纪英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最为显著的时代特征。促使英国乡村工业繁荣的因素很多，而最为关键的是英国乡村社会和农业生产的发展、变革，为乡村工业化准备了有利条件。第一，此时英国农业生产的长趋势增长，为工业生产提供了必需的粮食保障；第二，英国农业发展中所形成的专业化趋势，从结构上增大了购买纺织品和其他日用品的能力，为工业品增大了需求空间；第三，农业结构变革中溢出了大量剩余劳动人手，满足了乡村工业对劳动力的需求。

这些现象与同时期中国江南出现的变革有很多相似之处，因此，两者之间完全可以比较研究。

15—18世纪的世界经济发展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两个地区就是中国东部和欧洲西部。经济学家麦迪森（Angus Madison）新近对中国和欧洲历史上的各种主要经济指标作了估算，得出了以下结果：在欧洲工业革命完成以前，中国和欧洲（前苏联地区除外）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1700年，中国和欧洲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在世界GDP中所占比重分别为23.1%（中国）、23.3%（欧洲）；1820年则分别为33.4%（中国）、26.6%（欧洲）。1700—1820年间GDP增长率中国为0.85%，欧洲为0.65%。在引用了这些数据后，李伯重说：“在欧洲工业革命之前的几个世纪中，中国在经济发展的许多方面尚不逊于欧洲；在另一些方面，尽管欧洲的发展已明显加快，但中、欧之间的差异也还并不很大。”^②这种观点，对于以往流行的所谓“定论”——明代以后中国开始落后于欧洲，是很有意义的挑战。

无独有偶，2000年，美国学者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在美

王晋新《深刻而全面的经济变革——论16—18世纪中叶英国社会经济》，见侯建新《经济—社会史——历史研究的新方向》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237～259页。

② 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 1550—1850年》第15～16页。

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著作《大分流 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引起国际学术界轰动，2001 年获得了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和世界历史学会年度奖。2003 年此书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译本，中国学者得以一睹其风采。然而在此之前，一些学者还未读到彭慕兰的大作，就匆匆忙忙发表一系列否定性意见，说他不了解中国历史，援引的都是二手资料，显得过于轻率。

其实彭慕兰对这一课题是有研究积累的，这从书末所附长达 48 页的参考文献目录就可以感受到。不论你是否赞同他的观点，他的这本书对于我们研究这一时期历史，肯定有所启发，我们不是常说“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嘛！

彭慕兰在该书引言中概括了他的结论：直到工业化得到充分发展之前，欧洲并不比东亚好多少；工业革命前夜，欧洲并没有领先于东亚，但其制度促使工业化必然发生，东亚则不然。他在引言中还说明了撰写该书的目的是向欧洲中心论挑战，西方人写的世界史是以欧洲为中心的，东方则是语焉不详的衬托。他要反其道而行之，通过这本书让人们知道：第一，一旦去掉了中国作为欧洲假定的对立面，欧洲历史将会有怎样的解读；第二，一旦看到了欧洲与中国经济之间有相似之处，欧洲的历史将会有怎样不同的解读。他的大作的结论和目的，不论从什么角度看，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是历史学家感兴趣的，并非故意耸人听闻。学术贵在创新，人们应该善待创新。

他在该书中文版序言中，对题目“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 黄宗智译为“大分岔”）作了解释，从而进一步说明了他的目的。他指出，进行比较——东西方比较，必须选择恰当的“单位”——具有可比性的“单位”。具体而言，把中国与欧洲比较，把江南与英格兰比较，是有可比性的。中国与欧洲大小相当，中国有先进的江南，也有落后的西北；欧洲有先进的英格兰，也有落后的塞尔维

亚。1750 年的长江三角洲 有 人口 3100 万~3700 万 相当于一个欧洲国家 其经济发达程度 可以与英格兰加以比较研究 。

比较的结果，他颠覆了西方盛行的一种历史观点：西方的崛起与东方的停滞 或者说 19—20 世纪的历史是：北大西洋核心区——变革的发动机；世界其余部分——以不同方式作出“反应”。他认为欧洲核心区 北大西洋核心区 和世界其他一些地方 尤其是东亚 核心区之间经济命运的大分流，在 18 世纪相当晚的时候至 19 世纪时才出现。在此之前，即 18 世纪的中国，在知性和其他方面都比早先的著作对它的描述更有活力。彭慕兰和他的朋友王国斌都赞同布罗代尔的观点：清代中国 18 世纪 出现了“市场经济”但几乎没有出现“资本主义”。这并不表明中国落后于西方。他在书中多次引用一位日本学者杉原薰的研究成果，并且不无遗憾地表示，看到他的研究成果太晚了，书已经写了相当大一部分了。杉原薰说，1520—1820 年全球经济史的主体是“东亚的奇迹”：人口迅速增长，生活水平有节制地稳定地提高；而遥远的大西洋沿海有相当少量的人口似乎享有更快的人均增长率 。

彭慕兰认为杉原薰所说的“东亚奇迹”，完全可以媲美于工业化的“欧洲奇迹”。杉原薰指出，1500 年以来，西欧是“资本密集道路”，东亚是“劳动密集道路”。彭慕兰补充道，以 18 世纪后期至 19 世纪初期为分水岭，在此之前，欧洲也是“劳动密集道路”，在此之后，欧洲才是“资本密集道路”。

此书关注的另一个焦点是“原始工业化”，也叫“原工业化”或“早期工业化”，即工业革命之前的乡村工业化。他对“原始工业化”的界定在于：为市场而不是为家庭的手工制造业。比较的结果，1750 年欧亚大陆许多地区，农业、商业和原始工业，存在令人吃惊的相似之

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年，中文版序言 第 2 页。

② 同上书 第 5~8 页

处。1750 年长江下游人均生产的棉布，与 1800 年英国一样多。彭慕兰也指出了“原始工业化”的局限性，他写道：“对‘原始工业化’——现代欧洲早期农村手工业的巨大增长——的研究得出了一个类似的结论。戴维·莱文（David Levine）对英格兰农村纺织业的研究说明，一个农村纺织工人的收入不能养活一个家庭；如果没有某些农业收入或儿童劳动的参与，即使两个这类工人的收入通常也是不够的。”^②对于中国的“原始工业化”，他也指出：“中国长江下游地区在出售足够的棉布，输入足够的粮食和木材以维持原始工业的发展或维持其工人相对较高的生活水平方面，遇到了越来越多的困难。”^③

看了以上介绍，读者诸君可能已经有所发现，李伯重和彭慕兰两位学者的研究方法 with 基本倾向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种不谋而合，当然不是偶然的。大家不是都很追求“学术前沿”吗？在下以为，这就是学术前沿，国际学术前沿。从这个意义上，我是很佩服这两位学者的。前一段时期，一些学者对彭慕兰的非议，在我看来有所偏颇。而吴承明的评论则显得较为公允，他对于黄宗智与彭慕兰的论战，发表了这样的看法：

——“彭慕兰说，19 世纪以前是多中心世界，工业革命发展后才有欧洲中心。我完全同意。”

——“彭慕兰提出另一个指标，即看谁更接近于新古典经济学原则。他的结论是：18 世纪江南的小农经济比同时期英国的大地主

① 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第 15 页。

② 同上书 第 87 页。

③ 同上书 第 19 页。

④ 彭慕兰的《大分流》一书用大量篇幅批评黄宗智的“内卷”理论，即中国江南农村的家庭手工业是一种“内卷化”经济，是“边际报酬递减”的“没有发展的增长”。由此引起了黄宗智的反驳。他们不仅在美国交锋，而且把争论引到了中国。黄宗智在《历史研究》2002 年第 4 期上发表了长达 27 页的论文《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彭慕兰随即在《历史研究》2003 年第 4 期上发表了长达 45 页的论文《世界经济史中的近世江南：比较与综合考察》给予回应。